



当代藏族小说中的 女性形象研究

于宏 胡沛萍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当代藏族小说中的 女性形象研究

于宏 胡沛萍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欧风偃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严春艳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 于宏, 胡沛萍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690-0412-0

I. ①当… II. ①于… ②胡… III. ①藏族—女性—
人物形象—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9798 号

书名 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Dangdai Zangzu Xiaoshuo zhong de Nüxing Xingxiang Yanjiu

著 者	于 宏 胡沛萍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412-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序

钟进文

藏族当代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领域，2010年12月中央民族大学正式成立“985工程”文学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形成一个具有解决民族文学理论与现实问题能力的学术团队，将学科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为国家解决少数民族文学问题及制定文学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心在相关项目预申报基础上，经专家论证，确定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库建设系列、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民族文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系列、藏族文学研究系列、民族影视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研究系列，以及民族文学个案研究等重点建设系列，其中按族别形成的建设项目只有藏族文学。在学校“985工程”专项经费支持下，短短几年形成了藏族母语作家文库建设系列和藏族文学研究系列。出版的作品如下：德本加著、万玛才旦译《人生歌谣》，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扎巴著《桑布鹰傲与圣地拉萨》，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德本加著《无雪冬日》，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拉先加著《成长谣》，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扎巴著、龙仁青译《青稞》，青海民族出版社2013年。其中德本加著、万玛才旦译《人生歌谣》和拉先加著《成长谣》出版后，由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

序

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星泉翻译为日文，2014年12月由日本勉诚出版社出版发行。德本加著《无雪冬日》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完代克编《德本加小说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完代克著《加布青德卓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12年；吉多加著《藏族现代诗学》，青海民族出版社2013年；扎巴著《苯教神话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13年；扎巴编《写作经验漫谈》，青海民族出版社2013年；完代克编《百年拉萨诗歌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扎巴著《赤德颂道歌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增宝当周著《次仁顿珠小说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

2012年文学中心又召开了“藏族母语作家德本加小说研讨会”。此次会议填补了藏族母语文学个人创作研讨会的空白，创造了历史性的第一次。本次会议是对藏族母语文学的一次推进，与会专家学者认为，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文学空前发展，但藏族文学研究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藏族文化圈的学者对藏族当代文学的研究显得滞后。其次，有些学者用现代西方理论强行阐释母语作品，使得藏族文学的民族特性越来越淡。再次，藏族与藏族、藏族与汉族、藏族与国外的作家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较少，制约了藏族文学的发展。此次会议打破封闭局面，搭建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会议之后出版了各民族学者撰写的藏汉两种文字的《德本加小说研究》专辑。从母语文学角度看，藏族当代文学的作家构成包括藏族母语作家、藏族非母语作家、非藏族母语作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藏族母语作家已在藏族当代文学作家队伍中占到大多数，形成数量可观的藏族母语作家群。藏族繁荣的母语创作

与藏文刊物的发展也分不开，目前藏文文学刊物有《西藏文艺》《章恰尔》《邦锦梅朵》《拉萨河》《民族文学（藏文版）》等，藏族因其丰厚的母语创作和研究的实践经验，有理由贡献更多成绩，承担更多责任。

与此同时，使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形成一个创作群体。他们拓展民族文化守望意义，自由穿行于边缘和中心、传统和现代、藏文化和汉文化、藏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汲取多种民族文化养分，用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描述和展示着藏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藏汉双语并举，交叉并存，已经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客观现实，二元创作模式已构成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新面貌。

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看待这些作家的‘跨语际’‘跨族别’‘跨文化’创作成果在藏族文学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大环境和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如何解读在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疏离母语而运用汉语创作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及其创作成果，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

如上所述，进入新世纪后，藏族当代文学的方方面面都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仅笔者案头存放的成果就有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民族出版社2008年），卓玛《中外比较视阈下的当代西藏文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还有一批评阅评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以及申请立项的省部级课题等，可以说藏族当代文学的纵深研究已成趋势。

于宏和胡沛萍二位博士完成的《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

序

象研究》可以说是藏族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

本书认为女性的社会角色越是丰富多样,越能够表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就越能够表明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与重视。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要审视她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角色与地位,借此来检视整个社会为女性所创造的生活环境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进而探测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女性的关注和重视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关注与重视是否存在着偏差与误导,是否依然隐藏着对女性的种种习焉不察的忽略与歧视。同时,考虑到藏族社会自身传统文化特殊性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本书也不排除从民族传统文化那里寻找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以求更为切实妥贴地阐释当代藏族小说中“女性形象”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涵。

我认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其实就有一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味道。女权主义批评实际是一种怀疑的文本阐释学,它首先假定文本并非其所自诩的那样公正、客观、明晰,因而去寻找文本所掩饰的矛盾、冲突、空白和沉默,检验文学和美学判断的有效性,其出发点在于反对久远以来的男性中心说,主张将女性世界和女性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本书很多章节重点分析了小说作品中的妇女形象,积极探索了与妇女有关作品中蕴含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独特的审美体验。

总览全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对当代藏族小说中“女性形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当代藏族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女性形象,如知识分子、打工者形象,即使是地母型的女性形象,也与传统神女、圣女形象不同,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分类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藏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社会文化内

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二是对诸多女性形象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女性意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展示了看似相似的藏族女性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承载着的不同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尽管文学创作不是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但文学研究界常常会以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眼光来审视文学创作,希望从文学文本内发掘出那些内隐外显的重要的“非文学性”因素,诸如社会发展状况、时代精神风貌、人类生存状态、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思想意识等。从这种研究思路和学术目标出发,探幽抉微地寻求、开掘文学作品中潜藏的思想观念意识也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理路,因为它意味着对作品思想水准的探测,也意味着对作家思想水准和观念意识的评鹭。就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而言,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它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映照出作家个人,以及作家所处时代社会对女性认识、理解的程度和方式。某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往往意味着某种类型和方式的评价取向和观察态度,乃至情感寄托。本书努力从斑驳陆离的“女性形象”中获得特定时期社会对女性的认识深度与价值期待以及相应的评价机制。

当然,本书还可以聚焦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焦点——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一是透过对于作者、文本、阅读者、媒介等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谈论解析,发现其中隐含的权力运作、文化意义、价值取向、身份认同等社会建构功能;二是重视“性别差异”比较,在研究中加入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的作者性别,换言之,以作者性别来思考问题,以期促使人们认识到构成作者生活和文本的其他差异范畴。

总之,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绝非简单的人

序

物形象研究，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说此研究开拓了藏族文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和藏族文化传统中的女性社会、女性地位、女性意识、女性思维等密切相关，而且和当今社会非主流文化之丧失发言权与表达权，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乃至“自我边缘化”“自我客体化”等普世关注的焦点问题也密切相关。

藏族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富有者，一直以来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就在笔者动手撰写这篇序言时，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果。“骏马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级文学奖，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范围内通过层层筛选投票产生。本届“骏马奖”24部获奖作品中藏族占据4部，在3个翻译奖中藏族占1个，由此可见，藏族当代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藏族文学进行多领域多角度深入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是为序。

2016年12月

（钟进文，裕固族，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全国高等院校“霍英东教育基金”、国家留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基金等，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首席专家。）



绪论 她们的身影 / 001

第一章 藏族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概述 / 023

第二章 “受难—反抗”形象 / 037

第一节 “受难—反抗”形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 037

第二节 《清晨》中的受难女性 / 049

第三节 德吉桑姆：不幸的幸存者 / 066

第四节 娜真：从受难走向革命 / 082

第五节 “受难—反抗”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 / 095

第三章 天使形象 / 105

第一节 天使形象产生的文化渊源 / 106

第二节 天使形象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 / 110

第三节 天使形象的女性意识 / 132

第四章 尼姑形象 / 142

第一节 个人生命踪迹背后的社会变迁 / 143

第二节 难以忘却的红尘 / 147

第三节 被红尘缠绕的修行者 / 155

第四节 央吉卓玛：从出家为尼到寻找新生 / 169

第五节 尼姑形象的社会文化意蕴和女性意识 / 181

第五章 地母形象 / 189

第一节 地母形象产生的文化渊源与现实需求 / 189

第二节 地母形象的审美特征和文化负荷 / 197

第三节 地母形象的审美缺憾与“女性意识” / 211

第六章 知识女性形象 / 224

第一节 知识女性形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特征 / 224

第二节 知识女性形象的审美特征 / 227

第三节 知识女性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 / 237

第七章 打工女性形象 / 247

第一节 打工女性形象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形态 / 247

第二节 打工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和社会文化内涵 / 256

第三节 打工女性形象的多维审视 / 267

主要参考书目 / 285

后记 / 288



绪论 她们的身影

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自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女性遭遇“历史性的失败”之后，就不可逆转地沦落为“弱势群体”：始终处在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体系的束缚、压制之中，仅仅作为男性的附属物或第二性而存在着，从而无法获得独立，无法像男性一样成为社会的主宰或主人。这是女性仅仅因为生理性别不同，进而导致的社会性别上的差异而不得不接受的历史“宿命”。虽然自现代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女性自身力量的争取、推进中，女性已经越来越走向解放，获得了诸多社会权利，然而，即使如此，男女不平等依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但吊诡的是，女性的劣势地位却从来没有影响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对她们进行热烈、持久的关注。至少在文学创作这一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领域，女性始终是一个难以或缺，甚至是不能或缺的重要角色。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学忽视或忽略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在整个人类的文学史上，我们所熟

知的女性形象绝对不少于拥有社会大量资源和绝对话语权的男性形象。

尽管关注并不意味着重视和尊重，有时甚至是贬斥与蔑视，但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不断书写，却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表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女性的参与。这又反过来证明，女性成为弱势群体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必然存在着许多值得思考与审察的话题。这就意味着，有必要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去检视、辨析、清理这些话题，从而在尽可能开阔的视野中观察、考量、认识与女性有关的一切问题。毫无疑问，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作为现实女性的艺术写照和投影，就具有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而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思路也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这种有效性不仅仅体现在自古以来就有论者关注女性形象，通过考察阐释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揭示社会文化问题，更主要地还体现在自古以来，那些所谓的“天经地义”千古不变的关于女性的种种观念，有许多都是通过作家的文学创作传承下来的。就中国文化史而言，从早期的经史子集，到唐宋的传奇、话本，再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可以说正是这些流传久远，甚至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承载运营着关于女性的“天经地义”的看法与观念，一代又一代地渗透浸润到了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了不言自明、无须确证的金科玉律。这种情况在西方文化史中也大同小异。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基督教的《圣经》，再到后来的中世纪文学，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学，延至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都没有中断对女性的评头论足、说长道短。而一代一代的读者也是通过这样的艺术世界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和规范，想当然地接受了对女性的种种

看法。换言之，文化史上关于女性的种种观念和看法，现实生活中关于女性的许多认识、理解，并不是直接来自每个人的切身体验和调查研究之后的理性思考，而是间接地来自那些颇具艺术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可以说，艺术作品是人们认识女性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正是在这个“文化场域”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切关于女性的言说与评判。通过这个“场域”，人们认识的不仅仅是作为生理性别的女性本身，而是比生理性别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问题、文化现象和精神意识。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学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换句话说，尽管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人们情感涌动、精神劳作的产物，但它的源泉却是纷繁驳杂的生活现实。因此，不论作家以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手法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其作品在根本上还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类活动的反映和观照，即使是那些关注自己内心世界和抒发自我情感的作品，也莫过于此。如此一来，人们借助文学世界来探测社会风气，推究人伦道德，演绎哲理观念，评判文化价值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文学研究理路。而这种理路以何种方式介入文学研究，则由研究者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现实迫切问题决定，同时也与研究者个人的人生经历、兴趣爱好、知识背景有关。除此之外，还与被考察研究的对象所包容的“问题含量”有关。也就是说，被考察对象是否包蕴着足够引发社会关注的丰富而强劲的艺术能量，是否蕴含着能够激发研究者们把问题深入下去的“学术潜力”，是否能够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文化问题。就文学领域而言，“女性形象”就具备了这样的品质，包蕴了这样的能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

文学作品中出现女性形象以来，人们对它的探讨、评说、论争就没有中断过。无论是西方文学界，还是中国文学界，对“女性形象”的关注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其中，借助“女性形象”来推演探究社会问题就是一个长久不衰的“陈旧”模式。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样的情势更是水涨船高。这些问题往往都与女性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有关，也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走向完善有关，如女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家庭婚姻、教育就业等。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都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断言被认为是对“女性与社会发展进步关系”最有力的概括。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了人们借此批判男权社会，为女性“申冤”的一个理论据点，也成了热情关注女性社会生存状况的研究者们的一个理论基石，成了他们呼吁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借此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形在社会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似乎更为鲜明、显著、活跃。中国的“五四”时期就是这样一个相当典型的历史时期。“五四”一代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观念的作家和文化学者以反对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教，提倡平等自由民主的现代理性观念的历史使命为己任，在宣扬新的观念的同时大力批判传统规范中落后腐朽的消极因素，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解放与进步。基于这样的时代追求，“五四”一代作家与文化学者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其中一个非常显著而重要的共识是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五四”一代作家与文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要想彻底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观念，冲毁坚固的传统规范，就必须关注妇女问题，揭示妇女问题，并进而解决妇女问题，因为妇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所遭受的压制、剥夺

是最为深重的；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不解放妇女，那么中国社会摆脱旧有文化体制，创建新的符合人性的文化体制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所谓的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就是痴人说梦。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五四”一代作家在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新型女性形象，赋予了她们崭新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史对女性形象塑造的新纪元。

从上面所述可以获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元素，它可能蕴含着更宏大、复杂、深刻的社会文化问题。这就意味着研究“女性形象”必然有着自身的重大意义。尽管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早已进入了一个与过去相较而言相对文明、进步的社会，妇女问题也得到了逐步的解决，男女平等至少在国家制度层面和法律精神上得到了保证，但文化观念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着。对于当代藏族女性来说，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大致相同。这就意味着我们依然可以借助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来考察、探究当代文学是如何反映藏族女性的现实境遇和生活状况的，而这些考察也许会在以下一些方面对我们展示当代藏族女性的现实境遇和生活状况，以及她们的情感世界、精神风貌有所帮助。

第一，对女性爱情观念和婚姻家庭生活的描述。对于女性而言，恋爱、婚姻、家庭往往是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恋爱的甜美、婚姻的幸福、家庭的和谐，对于女性来说也许意味着许多，甚至是人生的一切。但现实生活给予女性的切身经验却不都是令人欣悦的，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也许是一种更为普遍恒常的体验。那么通过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这种恒常持久的生活体验，能够体味到当代藏族女性什么样的生命情态和生活

境遇呢？我们又能从作家对女性在恋爱、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两性关系中的位置的安排探析出创作主体什么样的女性观和性别意识呢？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去评判他们的女性观和性别意识对女性价值的提升所具有的正负能量？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仅依赖社会力量，也依靠女性自身的潜力，这种潜力的重要标识是敢于对阻碍女性合理全面发展的种种负面因素发出质疑，提出挑战，必要时还敢于抗争、坚决摧毁。从发掘潜藏在女性身上的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目的出发，我们考察当代藏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就是要从充满男权中心意识的文本空隙中发掘出隐藏在女性精神内部的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同时也要辨析、揭示作家通过“女性形象”投射到文本中的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

第二，对当代藏族女性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辩证审视。与男性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贡献力量一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女性的参与，人类历史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同样包含着女性的付出与贡献。但在过去男权意识占据绝对统治，女性被“剥夺”话语权的历史时期，女性始终处于被书写的地位，无法获得为自己申诉的自由与空间，她们的种种努力和贡献由此也沉寂在历史长河的底部，不为世人所知。同时，由于种种不合理的规范和制度的限制与压抑，女性被局限在狭小的生活范围之内，无法施展与生俱来的，完全可以与男性一比高下的才华与智慧，所以她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少之又少，即使是个别女性突破戒律，冲破藩篱，“出人头地”，她的社会角色往往也是非常单一而短暂的。在藏族古代历史时期，这是身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历史性宿命。这种被限制和压制的命运在近代以来开始有了转机。随着民主、自由、平等观